

新书

《中国经济站在了十字路口》

叶檀 著

【内容提要】

本书是叶檀对近年中国经济观察的萃取以及对未来经济预测与前瞻的倾力之作。它浓缩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智慧精华,与读者共同分享了看懂经济趋势的全新视角,传授了理性投资的逻辑分析和基本思维。其中包含叶檀对国际国内市场的数据分析与预测,对股市、楼市、金市、期货等领域的投资指导,对电商、传媒、旅游、煤电等行业的经济分析,对百姓如何正确理财的建议等。

【精彩摘要】

市场的真相

如今的一元钱,究竟能买什么?在钱越来越不禁花的年代,真是一块钱掰成两半花。除了买一份晚报、打一次电话外,一元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大部委机关食堂的一顿午饭,打工者街头一顿勉强果腹的早点,学生澡堂的两次洗澡……关于物价上涨的讨论甚嚣尘上,而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钱越来越不禁花了”。通货膨胀导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抵抗通胀”的怪圈中。

有些东西涨价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比如说上海的房子,比如说情人节玫瑰花,但是有些东西的涨价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似乎在突然之间,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走上了涨价的通道,比如猪肉的价格在短短两年里就翻了一番。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哪些因素抬高了我们的生活成本?各种涨价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如此真实地感受着通货膨胀给我们带来的生活压力。可是,当我们看到统计局的数据时,却发现这些数据实在与我们的切身感受有着天壤之别。

为什么我们对于通胀的感受和统计局统计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偏差?面对统计局的“离奇数据”,我们都会很直观地认为统计局有问题。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了:我们对降价的东西其实并不敏感。比如电子产品一直在降价,十年前,买一台彩电要几万块,而现在呢,可能只需要几千块;十年前,一辆桑塔纳汽车是二十多万,而现在只需要几万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大家容易忽略的方面,比如两年前一部三千块钱的手机,现在可能跌到了几百块钱,但是如果我们要买一部手机,可能还是会去两三万块钱的手机,而不是这个只需几百块就能买到的手机。

因此,CPI是一个全面的事情。为什么有人感觉在涨价,有人感觉在跌价,这说明市场真正的面目是有涨有跌,以涨为主,跌的比重稍微低一点。另外,不同的人可能对涨跌的感受也不一样。比如说,工薪阶层的大部分消费集中在吃和住,所以他们感觉到物价上涨得特别严重。但是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吃住并不是他们的主要开销。所以,生活用品的涨价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冲击最大。

虽然菜价未必全部是农民赚了,但是菜价不涨,农民肯定不可能多赚。物价上涨,实际上是社会对财富的一次重新分配。现在大量的农民都不愿意出来打工,因为他们在家里种菜的收入也不错。因此,农民的收入增加,就必然带动用工价格的上涨,只有这样,工厂才能招到工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对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那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的生活成本就相对提高了。

2012年,天涯社区有一条关于“80后春节回家要带多少钱才够”的帖子,点击率超过了三十万。楼主列出了自己春节的账单,并称“没有万元难过节”,引来了众多网友的跟帖。在近两千条的回复中,许多年轻人纷纷晒出了自己的春节账单,吐槽“过不起年”。

【作者简介】

叶檀,历史学博士,财经评论家。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新财富夜谈》特邀嘉宾主持,《每日经济新闻》主笔,《解放日报》经济评论员,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在《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经国家周刊》FT中文网等多家媒体开辟财经评论专栏。现居上海。

《中国经济站在了十字路口》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3年8月



连载

26

凤凰出版社

霍英东的一生,伴随着东亚政局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本书真实、详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霍英东对亲历往事的追忆,对敏感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内容涵盖东亚近几十年几乎每次重大变化的细节内幕,亦处处流露出霍英东一生洞察时局、捕捉商机的大格局、大智慧。



霍英东自述

霍英东 冷夏

邓小平登上“白天鹅”

但我们对此置之不理,仍然全力以赴,完全按自己的设想兴建、经营“白天鹅”。

在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提出一个“三自方针”:自行设计、自己施工采购、自己经营管理。

建一间大型酒店,需要采购大量的物品,大到空调、电梯、灯饰,小到杯、碗、盘、碟、牙膏、牙刷、拖鞋,大大小小物品不少于十种。在酒店施工期间或是开张以后,采购物品都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为了为内地培养出一批酒店采购专业人员,一开始就主张由内地人士负责采购工作。酒店所需物品,品种繁多,批量极少,且大部分要到境外采购,我们就从旁协助,结果他们做得很不错。

至于酒店的施工,我也主张由内地建筑公司负责,但一律采取承包的方式,把工程批给各个工程队。那时,“承包”对不少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

1982年10月15日,秋季交易会在广州开幕,世界各地的商贾云集广州。我决定10月14日试行部分营业,先开放已经装修好的两百个客房,让参加交易会的客人入住。在当时,“边施工、边营业”是少有的事,但我如此决定,一来想工程队加快施工进度,二来是想试一下营业准备工作如何。

秋交会开幕之前几天,我入住白天鹅宾馆,但当时房间尚未有空调,也没有热水和膳食供应。14日上午一大早,我亲自到厨房巡视,发现炉灶尚未安装好,泥头还未清理,煤气也没有,偌大的厨房只见一塘水。我非常焦急,因为参加交易会的客人中午、下午将陆续入住,而晚上,我已邀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作客。

我找来一位青年主管,对他说:“今晚我已邀请任仲夷书记吃饭,就算是四菜一汤,也要弄出来!”交待完毕,我仍然忐忑不安,担心厨房没办法把饭菜赶出来。

到了下午四点钟左右,任仲夷一行来到。我心里更不安,因为我原先以为只有几个客人,开几桌就绰绰有余了,谁知陪同任仲夷而来的却有一百多人。对厨房能否炮制出十多席饭菜,我心里没底,心想这次可能会出“洋相”,令客人难堪,也令自己下不了台,故心里七上八下的,极为不安。但出乎意料之外,客人入座后,端上来的不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而是十多样精心炮制的菜式,颇具晚宴规模。我开心极了,心里暗暗称喜:看来宾馆的员工颇有潜力可挖呀!第二天,酒店开始试业,部分营业终于成功。

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我的想法与别人不同。我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我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大胆放开物价。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当时的价钱是五角钱左右,白天鹅标价四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啤酒,外面卖四角八分,我们卖两元多,差四五倍。里面也一样,完全放开价格那还得了!主管经理不同意。但不放开价格又怎么办呢?我跟他们讲,白天鹅的售价成本,不能与街边的摊档相比,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这些都要计算在内,不然何以经营?商品经济就是要赚钱,要良性循环,要改善员工福利,要有利于社会繁荣。

白天鹅虽然只是一家酒店,但从其规模来说,实际相当于一个小市镇,客人和职工人数,经常不少于五千人,如果把为白天鹅服务的有关人员加起来,可能要超过一万人。要保证高标准地供应五千多人的衣食住行及水、电等等,是极不容易的,物资需求量很大,品种繁多。这些需要改变了市场,市场的需求也促进了生产,结果生产和市场渐渐活跃起来。现在,除了不道德的东西外,客人生活上的任何需求,白天鹅都可以给予满足。

其实道理很简单,物资价钱低,人们哪有积极性生产?物价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问题,但要搞市场经济,你不放开物价不行,所以邓伯伯那时就说要闯物价关,长痛不如短痛。1987年,我们在叶帅(叶剑英)家里吃饭,一位官员向我们透露:明天就要放开香烟、酒、火柴、油、锅等商品的价格了。那时很震荡,但这一关非闯不可。

我还记得以前内地连面包还做得不好,人民大会堂国宴用的面包一拿就散了;1980年我们中山温泉开业以后,面包价格开放,面包做得好一点的就卖到广州,广州人排队买。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想开放面包价格,但全民投票的结果是通不过。所以全世界看到中国这十多年的发展变化感到不得了。

白天鹅宾馆开业后,曾接待过不少世界各国的政要名流,其中有英女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中方高级领导人邓小平、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

1984年早春,邓小平登上“白天鹅”的二十八层“总统楼”,俯瞰珠江两岸景色,禁不住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开业的第一间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更大,有人因而把“白天鹅”誉为当代对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

情系亚运和奥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花在中国体育方面的时间较多。1984年9月,第八届亚洲足球锦标赛在广州举行预赛,参赛队员和大会工作人员全部住在白天鹅宾馆,他们的住宿费用几十万全由我们承担。

连载

137

海天出版社

1900年春,义和拳重镇山东鲁西各县,拳民教众火拼,杨家将后代揭竿而起,中国功夫遭遇西洋火器,一路北上,最终命归何处?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为何从观望、利用到镇压?百年后我们再看这段历史,是沉重?还是荒唐?是喜剧?还是悲剧?



各高官纷纷自杀

“没剩啊,除了我。呜呜……”

“来来来,你骑一会驴歇歇,咱还得跟着撤。”人到了这会儿会变得特别善良。

牛二坚决不肯:“不,吴叔,你有年纪了,还是您骑,我给您牵着驴。呜呜,就剩咱俩了呀。”牛二也是真伤心了。

“那你把那个锦囊盒给我吧,我帮你拿着。”吴神机说。

牛二急忙递了过去:“噢,对了,这锦囊盒本来就该给您,是六师兄让交给您的。”

吴神机急切的问道:“哎可是,你们紧要关头打开了吗,有什么锦囊妙计,管用了吗。”

牛二哭丧着脸说:“狗屁呀,里边就一本破书啊,是什么《论语》,还只有一半,那半本让撕掉了。”

“啊,还有这事……”吴神机急忙打开锦囊盒,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听得出,是那种感情十分复杂、并难以言状的大笑。以至于周围那些逃难的人们纷纷观望。

“吴叔,您、您、怎么了,不会气糊涂了吧。”牛二关切地问。

吴神机已经收敛了笑容,而是两眼呆滞,身子任由小毛驴晃来晃去。他没有正面回答牛二的话,而是小声的嘀咕道:“嗯、嗯,半部《论语》治天下,自古以来都这么说,但半部《论语》能抗洋人吗……”

满清政府还想在杨村一带组织最后的抵抗,遂任命长江巡阅使李秉衡任杨村前线总指挥。李秉衡是从江苏率部前来“勤王”的。一路鞍马劳顿,加之来得匆忙,基本上是仓促上阵。更可怕的是从天津撤下来的各路清军已成惊弓之鸟,士兵毫无斗志,各级指挥官也难以“节制”。李秉衡事后向皇帝禀报时说:“我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鼓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

这实际上就是溃不成军了,成建制的队伍溃不成军了,那么,只有两个人的队伍呢,那更是溃不成军了。吴神机和牛二夹在逃亡的大军中一路奔命,天黑时分方来到运河边的一渔户家中,好说歹说,花了10两银子,才吃了顿有热烫的饱饭,这还不能给人说自己说是义和团,只能说是逃难的老百姓。吃饱喝足,在这家人家的马厩里歇息时,牛二提出自己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红灯照的三仙姑,如果找到了她,也好有个依靠。吴神机眼看着两人陷入危机,唯此还算一条生路,便同意了,并给了牛二50两银子,以备不测。兵祸连接时分,银子也不值钱了。

牛二仗着自己年轻,也没休息,就趁夜出门找去了。他跌跌撞撞,走走停停,在杨村西南的一处外壕内,还真的找到了。因为红灯照娘们的叽叽喳喳的声音传得老远。她们正和部分清军及义和团混编在一起抗敌。因为平日跟三仙姑的特殊关系,牛二跟红灯照里的很多女将见面就胡稀堂(鲁西土语,即开玩笑)。但这次相见,大家都没了心情。一看到牛二,几个女将的眼圈就红了:

“牛二哥,你还活着啊。呜呜……”

“哭什么,三仙姑呢。”牛二感到有点不妙。

“三仙姑她……”

“她怎么了。”

“她、她、她让几十个洋鬼子给拖到戈登堂里糟蹋死了。呜呜。”一个姐妹哭着说。

另一个马上补充说:“不对,不是几十个,是上百个。”

牛二顿时怒火中烧:“他奶奶的洋鬼子,我砍了他们。”杨大虎的那把小鬃子他还带着。

“不是的,”一个小姐妹马上纠正说,“三仙姑不是让洋鬼子糟蹋了,是让洋鬼子给枪毙了,十几个洋鬼子排成一行,把三仙姑拉倒城墙根下给打死了,呜呜。”

牛二马上问:“是你亲眼看见的吗。”

那小姐妹说,不是,她也是听人说的。听谁说的呢,因为说的人太多,忘了。

牛二再问那个说三仙姑是被糟蹋死的姐妹,是你亲眼看见的吗。那姐妹说,不是,也是听说的,听谁说的呢,也是因为传得人太多,忘了。

“不对,三仙姑是让洋鬼子脱光了衣裳,扔到海河河里活活淹死了。洋鬼子站在河沿上笑……”另一个姐妹信誓旦旦的说。

牛二就说了:“你也是听说的,是吧。”

那姐妹没说什么,只是点下头。

你看看,都是听说。但事实是什么呢,只有鬼知道。中国历史上,因听说而被掩盖的真相还不知有多少。

还正想哪几句呢,洋鬼子开炮了。开完炮就进攻,一会的功夫阵地就垮了。牛二趁乱就窜了。

接下来的局面更糟了,一夜之间,杨村失守,整个所谓的防线一触即溃。再接下来,是满清各高官的自杀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自杀,直隶总督、大沽口炮台总指挥罗荣光自杀,刚刚上任的杨村防务总指挥李秉衡也在退往通州后的8月11日,在张家湾吞金自杀。至于下边的下级指挥员自杀的不被史书记载了。自杀,简单而壮烈,看起来是忠于朝廷,以死明志,以示壮怀。但细想一下,却为无奈之举,说是明志,不如说是逃避责任。再者,作为朝廷的败军之将,下场历来很惨。